



社區多元文化與社會包容之探討： 以台灣新移民女性為例

吳明儒

摘要

『社區』作為社會公民基本的互動場域，生活的接觸頻繁，建構出社會關係的架構。近年來，由於海外婚姻移入人口的增多，異國文化間的交流愈來愈密切，對於傳統社會政策或社區工作似乎迫切地尋求新的策略以回應新的問題與需求。特別是在傳統社區工作的途徑上「多元文化」的概念較少加以思考與運用，而本土社區工作模式對於「多元文化」的理解與運用仍在摸索，值得加以探討。窺諸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與社會運動的訴求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例如：女性主義(feminism)、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等，都產生政策觀念及工作方法上的深刻影響。台灣多元文化的觀念方興未艾，為免於產生歧視感，內政部 2003 年開始正式在法令上運用『外籍配偶』(foreign spouses)頒訂相關法令以匡正『外籍新娘』(foreign brides)等歧視性用詞，甚至運用更中性的名詞『新移民』(new immigrants)。本文擬以台灣女性新移民現象探討其多元文化、性別文化及照顧文化的多元困境，及其所提供的服務方案的檢討，進而對現行福利社區化的意義及內涵加以分析討論。最後，社區發展政策之缺乏多元文化觀點提出批判，期使社區發展組織逐步接納「社會包容」的理念，建構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價值，以及實務工作上的參考觀點。

壹、社會政策發展與性別範定

著名的英國社會政策學者 Richard M. Titmuss 於 1973 年過逝，其後人(Brain Abel-Smith and Kay C. Titmuss)整理其經典遺著『社會政策十講』一書流傳於世，

他最後一次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講授此一課程，是去世前的三個月。在該書的第三章『自由放任與恥辱烙印』(Laissez-Faire and Stigma)提到了以下的一段話：

隨著現代社會種族問題的出現，社會政策得到（或說應該得到）一種新的功能，一種社區關係或非歧視的整合功能。它有積極的角色——促進和諧的社會關係；但亦有消極的角色——防止產生種族歧視的感覺和事件。建立以社區聯繫為基礎的個人身分，是（或應該是）當前社會政策的目標。（Titmuss 著，江紹康譯，1991: 26）

雖然時空轉變，然而『歧視』與『烙印』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再加上全球化因素的影響，多元文化從誤解到歧視甚至形成社會衝突，成為社會政策新興的重要議題。不過 20 世紀末，隨著許多新興社會運動的發展，西方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受到來自各方的檢討與批判，其中包括女性主義(feminism)、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以及綠色主張(green)（吳明儒，2004；轉引自 Pierson, 1991）。前兩者因與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較相關，因此將以此為主軸進行論述，進一步思考福利國家與多元文化之間可能的關係。「性別」本身就是社會政策的重要核心價值，Ginsburg (1992)在『Divisions of Welfare』一書中從「分工」的角度加以探討，包括階級與福利階級分工、種族與福利種族分工、父權與性別分工，以這些不同的分工角度來檢視福利國家與福利政策。

女性主義者(feminist)對於福利國家的批判，主要是聚焦在福利國家如何造成「性別範定」(gender-specific)的結果。她們將

原本關切福利國家對於正式或貨幣經濟是否產生影響的重點，進一步的轉變為探討福利國家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換言之，女性主義者強烈的表達她們對於福利國家是建立一個以男性（父權）及資本主義利益為中心的不滿論述，女性只是被當成上述目標的犧牲品，女性在福利國家的控制下生產與消費，成為一種男性宰制的結果，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就如同勞動者對應於資本家一樣。為了維持資本主義長期的累積及發展，福利國家必須介入經濟及社會層面，以確保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由國家所支持的家庭形式」(state-sponsored family form)或者「依賴—女性家庭」(dependent-women family)的論述均認為其目的在維護資本的利益。其方法有三(Pierson, 1991:71-2)：第一、透過政府公共資源或女性的無酬家事服務，以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第二、已婚婦女成為潛在的勞動預備軍(latent reserve army of labor)。第三、照顧或再生產(caring/reproduction)服務雖然展現在經濟的薪資表現上，但是其「女性工作」所提供的就業卻是較為低廉的。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福利國家非但沒能提供女性較佳的生活保障，反而落入「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過程。女性投入社會福利產業(social welfare industry, SWI)是西方國家過去 30 年發展最快速的產業。依據 Rein (1985)的估計，在 1960~80 年之間，女性投入非農業就業的人口比率，美國成長 47%，瑞典成長 89%。而且投入福利產業的女性多半屬於兼職(part

time)工作(引自 Pierson, 1991: 79)。

貳、福利國家發展與少數族群

在新興社會運動中，對於福利國家的另一個批判是來自於與女性不利地位相同的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Cloward and Piven (1972)甚至認為「種族」(race)是了解美國福利國家政治的不二法門。如果將女性的「父權」及「資本利益」的概念運用在解釋現行少數族群的福利安排上似乎並不能獲得一致的共識，而是必須站在「社群的多數利益」或「國際資本的利益」的論述上。一個較為廣泛同意少數族群在福利國家中所面對的問題是「雙元過程」(dual process)的困境，一方面少數族群無法取得經濟及社會上的優勢(特權)地位，使得他們必須更加深化依賴福利國家。而另一方面這個被其所深深依賴的福利國家對於少數族群卻少能以多數社區的成員一般的同等對待。也因此，在同一個地理範圍之內的人民卻無法享有同等接近福利國家的機會，成為挑戰福利國家的理由之一。

從資本的利益來看，少數族群的勞動者有效地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Pierson, 1991: 81-2)：第一、移民勞工(immigrant work)無法與本地勞工般的享有各項福利，包括：住宅、失業給付、健康照顧等。第二、移民法限制了移民者及其親屬公民權的取得，以致剝奪其相關的法定應享的福利。第三、移民勞工的教育與訓練成本通常由

移民母國所支出，但是一旦接近或達到退休年齡之時，通常鼓勵其重返家園。因此，福利國家被批評為：為了確保資本利益以及男人/白人利益，在少數種族勞工不利地位的再生產過程當中，福利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幫兇。

從以上女性主義、少數族群的觀點，在面對承受雙重觀點壓力的新移民（婚姻移民）及其因應政策時，我們對於福利國家的發展到底應該產生什麼樣的反省與批判？這些針對福利國家所提出的改革呼籲，與最近台灣福利社區化產生何種關聯呢？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照顧服務產業化、市場化與社區化的「照顧混合經濟」(the mixed economy of care)模式成為一種最廣泛接受的議題，希望透過社區婦女人力的培訓，可以提供無數的就業機會，提高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但是在女性主義者的預見下，仍然無法跳脫「複製女性依賴角色」的效果。而外籍配偶或者女性新移民的人數在台灣社會不斷的攀升，大多數進入中、下階層的家庭，成為這些弱勢家庭的經濟或照顧的支柱，但是這些女性新移民卻必須經歷一段時間的等待期才能成為正式公民，被排拒在福利國家各種保障之外，卻無法排除「家庭照顧」的角色，此種「社會排除」的現象值得思考。

從社會工作發展的角度來看，在性別或族群的議題發展之前，「貧窮文化」或「依賴文化」卻是更早受到重視，19世紀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成為現代社會工作的先驅，在東倫敦的教會中神父 Canon Samuel Barnett 認為

應該與貧窮者生活與工作在一起才能更瞭解他們的想法，並建立睦鄰中心(neighbourhood settlement)；牛津大學的教師 Toynbee 即呼應這樣的想法，後來建立了 Toynbee Hall，可容納 14 個大學生及研究生，提供音樂、教育等課程，成為最早期對於以社區為基礎的介入模式(communitiy-based intervention)。著名的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報告書的撰寫人 William Beveridge 爵士曾經在 1903-1907 年在 Toynbee Hall 工作過，英國工黨的首相(1945-1950) Clement Atlee 則在 1909-1910 年同樣在睦鄰中心得到許多寶貴經驗(Stepney & Popple, 2008: 136)，可見其影響力之深遠。這也讓我們體會到 Toynbee 的哲學，面對不同的文化，我們必須尊重其價值且平等以待(Stepney & Popple, 2008: 135)。因此，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必須從社區的角度加以檢視，營造社區友善的多元文化氛圍。

參、多元文化下的社會形構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源自於 1960 年代擴及歐美的民權運動與抗議風潮，當時美國的有色人種、原住民族等少數族群在美國南方與各個大城市的街頭爭取平等、反歧視與反貧窮，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在 1963 年的演說“I have a dream”最具代表性，隔年(1964)他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The Nobel Peace Prize)的得主，終而促成了「特別保

障法案」的福利政策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王振寰、瞿海源, 1999: 245)，可惜 1968 年當他前往田納西州聲援垃圾環保工人團體的遊行時，遭到刺殺身亡。

而福利國家的典範—瑞典，對於少數族群的問題一直到 1960 年代才有較為積極的政策作為，在瑞典的移民必須經過五年的居留才能成為瑞典公民，挪威只要兩年，相較於其他的資本主義社會，北歐的國籍歸化(naturalization)政策顯然是較為寬鬆(Ginsburg, 1992:47)。在 1964-1974 年間瑞典社會經歷冗長的討論及公眾諮意，到底是要繼續原有的涵化意識型態(assimilationist ideology)或者應該要採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t)的策略。最後終於在 1975 年制定移民法(Immigrant Policy Act of 1975)，並且對於瑞典境內的移民及少數族群社區採取自由、多元文化的意識型態。該項政策的三個主要目的為：生活水準達到相同的標準、文化的自由選擇權以及不論是本地瑞典人或少數族群必須達致政治團結(political solidarity)。據此，瑞典政府開始推動少數族群成立政治、社會及文化組織及活動，一定範圍內的雙語學校，1976 年開始居留三年即享有區域性選舉的投票權。其次，則是勞動市場的均等化，社福權利的公平享有。雖然如此，外籍勞工的事故率是本勞的兩倍，少數族群社區仍然未能有效的使用福利資源，而因為族群所產生的衝突仍然存在(Ginsburg, 1992:47)。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不同的時期有不同因素與背景的移民潮，婚姻移民是晚

近規模較大的移民潮。主要有兩個來源：大陸、港澳地區及東南亞地區。以2001-2008年間觀察，最主要來自大陸地區，因為同文同種的關係再加上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其次為東南亞地區。不過，近年來有趨緩的情況。台灣跨國婚姻因政策管制，逐年減少，2003年平均每三對結

婚登記，有一對是跨國婚姻，大陸配偶占六成。2008年，平均每七對才有一對跨國婚姻。觀察8年前後的變化，大陸婚姻減少約1/2，東南亞則減少2/3（參見表一）。減少的原因之一為2003年開始，內政部實施大陸配偶面談制度有關。

表1：2001～2008年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

	大陸、港澳地區		外國籍	
	大陸	港澳	東南亞	其他
2001	26,516	281	17,512	1,893
2002	28,603	303	18,037	2,070
2003	34,685	306	17,351	2,292
2004	10,642	330	18,103	2,235
2005	14,258	361	11,454	2,354
2006	13,964	442	6,950	2,574
2007	14,721	425	6,952	2,602
2008	12,274	498	6,009	2,948

資料來源：內政部轉引自中國時報(2009)

外籍婚姻所產生的社會變遷，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離婚率的居高不下，例如以嘉義縣為例（參見表二），2004年大陸港澳配偶的離婚率為14.68%，離婚對數全台第2低（全國排名第22位），僅比彰化稍

高。異國離婚比率全台第1（與大陸港澳配偶離婚比率全台第4，與東南亞外籍配偶離婚比率全台第1）。新生兒母親為外國籍比率全台第1。新生兒母為外國籍比率台灣平均9.47%。

表二：嘉義縣外籍配偶資料統計分析

	2004		2005		2006		2007	
	對數	百分比	對數	百分比	對數	百分比	對數	百分比
一、結婚對數	3,344	100%	3,241	100%	3,080	100%	3,006	100%
(一)異國聯姻對數	1,020	30.50%	786	24.25%	603	19.58%	642	21.36%

1.外籍配偶	721	22%	433	13.36%	218	7.08%	257	8.55%
2.大陸港澳配偶	299	8.94%	353	10.89%	385	12.50%	385	12.81%
(二)本國聯姻對數	2,324	69.50%	2,455	75.75%	2,477	80.42%	2,364	78.64%
二、離婚對數	1,315	100%	1,329	100%	1,436	100%	1,184	100%
(一)異國離婚對數	290	22.05%	328	24.68%	350	24.37%	300	25.34%
1.外籍配偶離婚	97	7.38%	155	11.66%	170	11.84%	145	12.25%
2.大陸港澳配偶離婚	193	14.68%	173	13.02%	182	12.67%	155	13.09%
(二)本國離婚對數	1,025	77.95%	1,001	75.32%	1,086	75.63%	884	74.66%
三、新生兒總數					4,353	100%	3,526	100%
(一)新生兒母為本國籍					3,606	82.84%	3,001	85.11%
(二)新生兒母為外國籍					747	17.16%	525	14.89%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社會處(2008)

以嘉義縣為例，為能提供外配家庭相關的福利服務，2004 年開始委託嘉義縣生命線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其功能目標有下列幾項：（嘉義縣政府社會處，2008）

（一）運用專業人力與個案管理方法，以家庭處遇為焦點，提供外籍配偶及其家庭整合性之全方位服務，俾更有效與積極滿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多元性需求。

（二）為加強本縣外籍配偶有關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婦女職場安全等議題之認識及自我保護概念，將積極宣導人身安全防治觀念及強化其運用資源的能力與意願。

（三）規畫語言訓練、生活適應、文化民俗等課程安排，協助外籍配偶了解我國文化及民俗風情，以及早融入社會與家庭生活適應外，並透過教育方式提供外籍配偶更多元化的思考訓練，讓外籍配偶接受

更充足的資訊及價值概念的啟發，進一步爭取合理之權利（right），來彰顯兩性更豐富的使命與責任。

（四）協助外籍配偶學習家庭財務管理的觀念和方法，並提供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其爭取經濟獨立自主，積極投入參與我國勞動市場。

（五）為促進外籍配偶對自身權益和公共事務的關心，加強外籍配偶的社區化教育及組織能量，協助外籍配偶開拓出更寬廣的女性意識空間，以增權觀點培養其覺察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學習表達其需求和想法，作為政策研擬之參考。

肆、照顧、性別與族群—多元結構困境

根據嘉義縣婦女福利團體負責人或幹部的訪談研究結果發現（吳明儒，2005: 25-26）：外籍配偶婦女福利需求最重要的

前三者為：基本權力保障(124)、第二專長培訓(98)及法律諮詢服務(93)（參見表三，圖一），對於外籍配偶婦女的權益保障及

法律諮詢的服務未來應該可以考慮加強。至於弱勢家庭兒童課後輔導(86)、受暴婦女庇護中心(83)則也應該重視。

表 3：外籍配偶需求重要性

外籍配偶需求項目	重要性強度
01 子女課業輔導	74
02 弱勢家庭兒童課後輔導	86
03 單親家庭關懷成長班	51
04 婦女成長講座	65
05 第二專長培訓	98
06 婦女學苑（如:英文課程）	51
07 受暴婦女庇護中心	85
08 情緒管理、壓力調適	83
09 法律諮詢服務	93
10 基本權利保障	124

說明：每一題 1-5 分，分數愈高表示重要性愈強。

資料來源：吳明儒(20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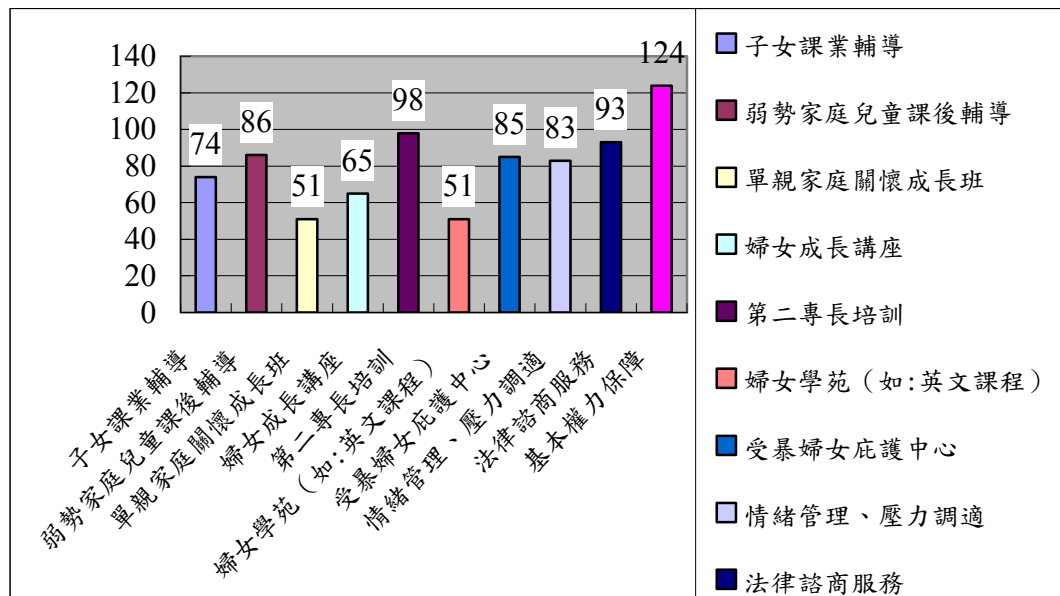


圖 1：外籍配偶需求重要性直條圖

福利制度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有其密切的關係，因此福利國家可以說是一種回應人群問題或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手段。但是福利國家所面對的結構性需求時，許多結構性問題來自於國家的介入。如同前述的調查中發現，多數婦女團體的幹部認為外籍配偶最迫切的需求，應該是基本權利的保障，但是國家對於公民身分的取得卻有一定的審核標準。

其次，在台灣有許多社區中，我們感受到了的是希望外籍配偶如何儘快融入我們的社會，趕快讓外籍配偶扮演照顧者、生育者的角色。因此，多元文化的理念幾乎流於空談，外配家庭服務中心似乎也是扮演涵化的角色，讓外籍配偶隱藏、捨棄自我的文化，完全接受本土的文化。外籍配偶的家庭多半居於社會階層較低者，而其所衍生之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問題及婚姻暴力等問題逐漸顯現，法律諮詢上的需求自然會浮現。但是我們還是落在自我文化的價值之中，而未曾瞭解不同文化下的夫妻、婚姻及家庭觀念的差異。

外籍配偶來到台灣人口結構老化的社區，特別在許多鄉村地區，缺乏照顧人力，產生新的結構性需求，在政府未能有效規畫社區照顧服務體系的前提下，透過市場引進外籍配偶成為立即而有效的手段，Donati, P.(1987)認為這是一種扭曲，所謂「國家與市場之間關係所呈現出來的結構性扭曲的前提條件」(註 1)。國家與市場之間邏輯關係的安排，事實上並不在社會

所規制的社會關係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之內。這也就是說明在一個社會區隔(social segment)以及講求行動自主(action autonomy)的狀態下，產生的結果不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的衝突與矛盾，同時也反映出科層式的社會立法所產生的「行政統制」(administrative regimentation)。

顯然國家(照顧責任)、家庭(女性主義)及社會(少數族群)都不是以多元文化的角度站在外籍配偶的一方，而在同化主義(assimilationism)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左右兩個端點，我們也許可以較清楚可理解外籍配偶來自一文化而卻必須向另一個文化完全臣服的掙扎。國家介入與家庭干預之間的推拉效果(參見圖二)。Donati, P.(1987)提出從自我治理的勞動社區(self-governed work community)到自助組織(self-help organization)以及無處不在實施公共及社會功能的社會活動的概念，因此外籍配偶只能透過私人且非正式的互助團體來滿足自身文化的認同與心理需要。Donati, P.將這些在國家與市場之外的活動稱之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合作部門」(cooperative sector)、「自主部門」(autonomous sector) (p.32)。它們的共同特徵為「社會－私人」(social-private)的特質，不過對於跨國文化下的新移民，在現行的福利國家結構下，目前這種具有文化尊嚴的自主性團體仍然少之又少(註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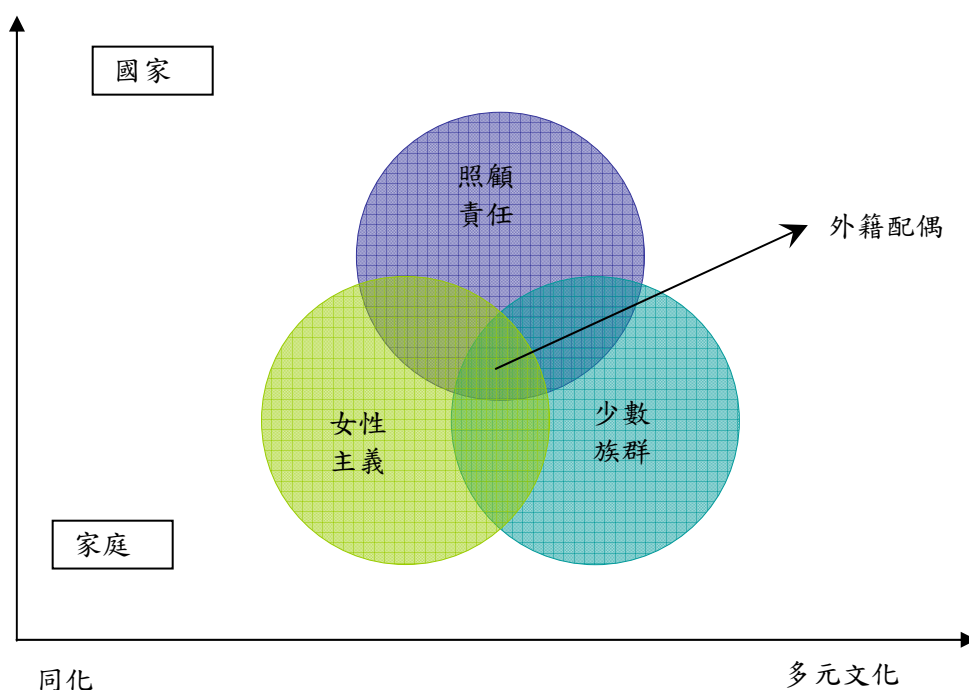


圖 2：外籍配偶多元困境架構圖

伍、福利社區化概念的再討論

針對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各種需求，各縣市紛紛運用福利團體的力量設立「外籍配偶服務中心」、「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外籍及大陸配偶服務中心」或「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等單位，舉辦兒童學齡前啟蒙服務、兒童課後照顧、機車考照班、生活適應班、識字班等方案；甚至鼓勵外籍配偶成立新移民協會。從此一「中心」、「方案」到「協會」的多元發展現象，也正是政府與民間福利多元發展，從走入機構到走向社區、從被動接受服務到主動培力展能，從社會排除邁向社會包容，目的在建構社區福利服務網絡，使其更貼近

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需求。

福利社區化的發展趨勢可視為福利國家轉變的一種特徵。以英國為例，福利國家的發展轉變，在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下，國營事業要民營化，政府組織要企業化，甚至從民間企業尋求政府閣員，因為它們較具備企業管理的理念(enterprise-minded ministries)。此類的目的是要將企業文化全面的開展到政府部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強調地方政府應該與商業部門或第三部門建立夥伴關係；再者如鼓勵私有化、成立新的合法團體來監督私部門的壟斷。但是，為了能夠更為順利的從福特主義過渡到後福特主義，並且解決福特主義所產生的問題及所衍生之社會成本（註3），余契

爾政府甚至在發展初期以威權的方式來要求制定「公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績效排行榜(league tables)、以及加值(value-added)宣告。因此，許多原本國家的福利功能轉移到「家庭」、「社區」及「第三部門」，此處的社區包括了自願組織、父權家庭以及單親婦女，以減輕政府在福利上的財政負擔。但是，這些社區的組織許多都是由政府所介入而成立的，並非由自願或自發的組織，彼此之間的關係也非如想像般的密切，但是第三部門應該就像社會組織或價值中的小型或分子般的，彼此之間並非意圖產生某種結果，但是卻產生了經濟或政治建構的副產品。

在台灣社區型的第三部門主要型態似乎無法不與「社區發展協會」聯想在一起，但是社區組織在外籍配偶服務方案中似乎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價值下，社區是建構多元文化氛圍的重要場域，讓外籍配偶真正能夠走出家庭，重建其文化自信。從 2001 年開始內政部辦理社區發展評鑑工作，2005 年評鑑開始規定社區在社區評鑑主題自選三項中，其中至少須有一福利社區化工作或社區守望相助工作項目，2006 年則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情況』列入縣市政府辦理福利社區化業務的考核項目之中（吳明儒，2008:7-14）。可見福利社區化隨著中央政府重點政策的改變其內容也會隨之調整。因此，對於『福利社區化』的內涵是需要地方政府、社區組織、學者專家充份討論而取得共識的。若按目前內政部社區評鑑主題對於『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的說明，

大致上分成兩種類型：

（一）提供（一般性）福利措施—辦理老人、兒童、青少年、身心障礙及婦女等福利人口群的社區服務；

（二）提供支援性福利措施—其一為辦理日間托兒（老）、居家服務、喘息服務及長期照顧等社區支持性服務，其二為建構社區福利網絡。

前述兩種類型的界定十分的模糊，如（一）項中的老人社區服務與（二）項中的日間托老的差異為何呢？如果將（一）項視為『一般性』社區服務，將（二）項視為『特殊性』社區服務，則第（二）項中的『特殊性』社區服務項目如居家服務、喘息服務及長期照顧都非社區發展協會中只有志工而無專業人員所能勝任的工作。而『建構社區福利網絡』則缺乏操作性的指標，社區根本無所適從。

另外，在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的第（七），也提到社區組織『設置福利服務工作小組，運用社會資源辦理社區福利服務工作』，但是該『福利服務工作小組』到底如何組成，其功能、運作、管理...等等均未見說明，社區組織中有設立類似小組的也少見。

到底『福利社區化』的內涵為何？應該經由社區學者專家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充分討論，找出社區有所依循的內涵或操作性指標（吳明儒，2008）。因應社區內外籍配偶家庭的出現，應該將外籍配偶的服務方案納入福利社區化的內涵，建立社會包容的環境，並且與外籍配偶服務中心相互配合；其次，社區應該建立一個文化多

元的友善環境，取代社區排除與冷漠，從彼此文化交流中，鼓勵展現外籍配偶社區異國文化的多樣性。

陸、代結論：社區發展納入多元文化元素

台灣過去由文建會所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概念，藉由行政資源的投入，企盼達到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革目的。雖然「文化建設委員會」扮演主導角色，但是在「多元文化」的概念闡釋與本土化的推展上都十分缺乏。然而社區與多元文化在國外的行政部門中關係，卻是非常密切。例如新加坡設立社區發展、青年及體育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同時並將性別包含其中，設有女性服務台(Women's Desk)。澳洲也設家庭、住宅、社區與原住民事務部(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 and Indigenous Affairs)並設立女性辦公室(Office for Women, OFW)。因此，如何將多元文化的價值與精神融入社區之中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包括性別主流的觀念，原住民族的文化保存、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等都應該加以妥善規劃。

雖然「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兩者在社區自主的培養、社區參與的倡導、社區意識的提升及社區資源網絡的連結等有相當的一致性(黃源協, 2000: 274)。不過，「多元文化」仍受到政策規劃者的漠視。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是有利於多元文

化的社區發展歷程。在 1994 年「社會福利社區化」概念提出來之前，社區似乎並不是一個福利供給的單位或組織，而比較接近是一個地方資源管理中心，例如社區活動中心的管理與使用；村里則對於社會救助中貧戶的資格具有初審與呈報的行政科層功能。「福利社區化」與西方國家福利多元主義之間的相似之處，在於其基本精神均認同「以社區為基礎的自願自理組織」(community-based model of voluntary self-organization)以取代過去政府的角色，由於政府在 1980 年將過去社區理事會轉變成為社區發展協會，從一個官訂的組織轉變成為是一個由社區民眾自發組成的人民團體。除了政府之外對於民間組織的重視，似乎成為福利國家危機之後的「福利正確」。因此，回歸人民團體的社區組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強調「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一、解除「性別文化」的禁錮與圖騰

性別主流是一種主流價值，不應侷限於外籍配偶，而是外籍配偶在多重文化禁錮之下，使她們連在做「女人」之前，先做「人」的權利都沒有，社區應該建立更包容的社區氣氛。每年內政部所舉辦的績優社區評鑑標準，也應該強調並鼓勵社區發展組織將「性別主流」與「多元文化」理念的融入。

二、縮短族群文化間的距離

在少數族群社區的研究中，經常因為與外界的缺乏互動與瞭解，因此產生刻板

印象、偏見，最後成為社會歧視與種族對立。因此，社區可能變成傳遞多元文化的「中介部門」(intermediary sector)。在社區中傳遞各種福利服務必須更尊重文化的差異，而非以經濟優勢輕蔑異國文化的價值。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移民，必須具備調適跨文化間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多元差異的能力。

三、掙脫文化霸權

台灣逐步面臨社區中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外籍配偶成為扮演子女或老人照顧的角色，各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均以深化其家庭照顧角色為目的，形同一種文化霸權的入侵。「文化霸權」或者「男性文化霸權」是權勢族群掌握弱勢族群的利器，「文化福利權」應該是作為掙脫「文化霸權」控制的手段；社會福利的實施應以維繫或發展其民族文化為前提（李明政，2003: 69）。外籍配偶的各種政策與方案應

該盡量減少或避免各種文化霸權及家父權的思維。

四、建立多元文化的互動機制

西方福利國家在政府角色上有所改變，在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上，愈來愈重視地方（政府）的角色，甚至授權由地方（政府）來決定是否由市場來提供服務的手段。在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關係上，愈來愈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自主精神，重視各種非營利組織或非正式組織的功能角色，企圖建立起政府與民間新的夥伴關係。從福利地方化及建立夥伴關係的角度，應該鼓勵外籍配偶成立自發性之社團，參與社區發展組織或媽媽俱樂部。在該縣市外籍配偶達到一定比率以上（原住民族亦復如此），就必須選派代表進入縣市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擔任委員。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副教授）

註釋

註 1：這一段話的原文為“Structurally distorting conditioning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參見 Donati, P. (1987: 32).

註 2：筆者曾經輔導多元就業方案某一縣的外籍配偶自主所成立的協會，她說協會辦活動都會邀請母國的大使級的外交官員參加，讓她感到驕傲。

註 3：例如因為國營事業民營化直接影響到勞動者工作權的保障以及薪資福利等問題所帶來的抗爭與衝突。

參考文獻

王振寰、瞿海源，199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吳明儒，2004，**福利國家發展與社區發展策略的關係——兼論台灣的社區發展策略**。發表在 2004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快樂兒童、活力老人、健康社區——建構台灣社會福利的新願景》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台中健康管理學院。
- 吳明儒、陳竹上，2005，**台灣社區發展組織政策變遷途徑之探討**，收錄在編著《台灣的社區與組織》，頁 130-168，台灣：揚智出版社。
- 吳明儒，2008，**建構社區能力提升之社區發展策略**，97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頁 7-14。內政部。
- 吳明儒，2005，**嘉義縣婦女福利方案的實施以及需求評估**。嘉義縣政府委託計畫。
- 李明政，2003，**文化福利權**，台北：松慧。
- 黃源協，2000，**社區照顧：台灣與英國經驗的檢視**，台北：揚智。
- 蘇景輝，1996 **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初版）**，台北：巨流。
- Butch, H., Andrew Glen, Paul Henderson and Jerry Smith (1993).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Pluto Press.
- Cloward, R. and Fox-Piven, F. (1972).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ondon.
- Donati, Pierpaolo (1987).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ies and New Social Options: Replies to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vers, Adalbert, Nowtony, H. and Helmet Wintersberger edited, *The Changing Face of Welfare*, USA: Gower.
- Jessop, Bob (1994).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and the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 in Burrows, R. and Brian Loader edited,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Pp.13-37. London: Routledge.
- Johnson, Norman (1987).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Gilbert, N. & Terrell, P. (2002).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 Ginsburg, Norman (1992). *Divisions of Welfa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London: SAGE.
- Glen, Adrew (1993). "Methods and Themes in Community Practice." In Butch, H., Andrew Glen, Paul Henderson and Jerry Smith, *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 pp. 22-40, London: Pluto Press.
- Pestoff, C. A. (1998). *Beyond the Market and State: Social enterprise and civil democracy in a welfare society*. England: Ashgate.
- Pierson, Christopher (1991).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 Welfar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M. Titmuss 著，江紹康譯(1991) 社會政策 10 講，香港：商務印書館。
- Stepney, Paul and Keith Popple (2008). *Social Work and the Community: A Critical Context for Practice*. England: Palgrave.
- Svetlik, Ivan (1993). “Regulation of the Plural and Mixed Welfare System.” in Evers, Adalbert and Ivan Svetlik eds. (1993). *Balancing Pluralism - New Welfare Mixes in Care for the Elderly*. Pp.33-50. European Centre Vienna, Avebury.
- Til, Jon Van (1988). *Mapping the Third Sector: Voluntarism in a Changing Social Economy*, USA: The Foundation Center.
- Walker, A (Ed) (1982). *Community Care. The Family, The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Walker, A (1993). *Community Care Policy: from Consensus to Conflict*. In Bornat, Joanna; Pereira, C.; Pilgrim, D. and Fiona Williams, *Community Care: A Reader*. London : Macmillan.
- Wuthnow, Robert (1991). ‘The Voluntary Sector: Legacy of the Past, Hope for the Future?’, in Wuthnow, Robert edited (1991).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3-2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